

# 南亭法師與戰後中國佛教會的運作

## ——功成不必在我的哲理實踐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牟立邦

###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南亭法師（1900-1982年，以下將簡稱南老），於戰後對中國佛教會組織的發展和運作參與。本篇有別於單一世俗視角探討南老與中國佛教會組織關係，在已有之研究成果上，透過更精細的文獻分析對比，和專究南老內心思維的視角，檢視南老佛學哲理的實踐。全文共分三部份展開論述，內容分別為先師的傳承與啟蒙，談及光孝寺住持常惺法師，同為南老沙彌時期的親教師，於大陸時期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之情況，及所傳承之哲理態度；其次，在台復會的虛懷若谷，主要論述 1949 年後中國佛教會遷臺復會歷程，從而進一步解析南老的謙讓之心；最後，功成後退以提攜後進，談及南老和中國佛教會人事互動關係，充分體現了南老對中國佛教會組織的無私奉獻。

**關鍵詞：**台灣佛教、中佛會、常惺法師、華嚴宗、佛法實踐

## 一、緒論

南亭法師（1900-1982年，為精簡篇幅與對南亭法師的尊重，以下內文將以南老簡稱）<sup>1</sup>，本籍江蘇泰縣，幼年受佛法感悟出家，沙彌期間至泰縣諸山合資創辦儒釋初高等小學校就學，至此和智光法師（以下將簡稱智老）<sup>2</sup>結緣。1921年受戒後，隨後入安慶迎江寺佛學院就讀深造，此後在佛學院任教三年，藉著「教學相長」的機會，學力大進逐漸得窺典籍的精華。1931年光孝寺創設佛學研究社，南老辦學卓著，教學認真，更是讓後來沙彌時期的成一（以下將簡稱成公）<sup>3</sup>有所嚮往，進而結成師徒之緣。抗戰爆發之際，南老救民於水火之中，不時率僧寺支援軍需，以共赴國難，至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旋即再起，對此於1949年護侍師父智老來台。此後期間，擔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常務理監事，負起因遷台而支離破碎的復興大任；同時另一方面不辭勞苦，積極籌畫印製法寶經典，奔走四出講經說法，以致力於華嚴宗的弘傳，並關照新建華嚴蓮社的發展。其一生隨喜功德，不求回報，遂成今當代佛學大師之一。<sup>4</sup>

\*本文初稿承蒙侯坤宏教授、陳一標教授和堅融法師，給予寶貴的建議修改，謹此致謝。

<sup>1</sup> 在康熙字典裡便有提到，按照《周禮·地官·鄉老註》解釋，「老，尊稱也」，亦即是對德高望重的長輩尊稱。而南亭法師過去也曾自述到「我名南亭，自從泰縣光孝寺方丈退休以後，人亦照例以『南老』呼之」。不過南亭為人低調內斂，對於眾人冠以「南老」的尊稱，表示到「不勝驚奇」；可以見得其謙虛性格。南亭，〈壽老與南老〉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頁206。

<sup>2</sup> 智光法師（1889-1963年），江蘇泰縣人，法名彌性，字文覺。1902年剃度出家，日後於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入揚州普通僧師範。1908年智老進入祇洹精舍深造，與太虛、仁山同窗，研習佛法。民國肇建，時局暫且安定，於泰縣諸山聯合開辦「儒釋初高小學」，智老受聘擔任校長，南亭便是智光法師的弟子之一，始受智老教導啟發。1914年智老入華嚴大學，從月霞老法師專研華嚴宗，此後數年追隨月霞輾轉在杭州、常州等地講經，深入賢首奧義。1921年起於泰州北山開化禪寺掩關三年，學力大進。後於焦山定慧寺任監院，期間更兩度赴香港開講《普賢行願品》，一時開香港學佛新風氣。抗戰爆發後，首創福田工讀社，提倡生產報國，濟弱扶貧。1949年與南老共赴臺灣，創建華嚴蓮社，延續法脈宏傳，可謂近現代華嚴宗一代大師。釋成一原著，《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7年），頁103-109；李守靜，〈鎮江焦山佛學院〉《鎮江文史資料》第7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鎮江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年，頁83-91；華嚴蓮社，「第一任 智光和尚」網站，[https://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2099&modid=392&mode=](https://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2099&modid=392&mode=)（2022/03/16）。

<sup>3</sup> 成一法師（1914-2006年），江蘇泰縣人，俗姓王，號成一。1929年於觀音寶剎出家剃度，1936年入光孝佛學院攻讀佛學，頗受智老、南亭啟發。然抗戰爆發時局混亂，經智老建議，開啟其弘法兼行醫的道路，懸壺濟世。戰後勝利東渡來臺，乃開辦「覺世圖書文具社」，以助佛經的流通。1949年中原板蕩局勢大亂，在其安排下，接智老、南老來台灣弘法，協辦創立華嚴蓮社。此後，更積極開展漢傳華嚴宗，陸續創辦華嚴專宗學院、創刊《萬行雜誌》，創設美西華嚴蓮社、支援恢復泰縣光孝寺祖庭等，其用心努力，備受各界肯定。詳可參見釋成一原著，《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7年）。范觀瀾，《成一法師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

<sup>4</sup> 綜合參閱：釋南亭原著，《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年）；釋成一、釋聖嚴，《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臺北：華嚴蓮社，1983年）；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

學界對於近代以來的中國漢傳佛教的組織、團體、人物等相關研究不可勝數。而有直接概括本文南亭法師與戰後中國佛教會之相關議題，首先是 1954 年由南老親撰的〈六年來「中國佛教會之成就」〉，完整敘述了抗戰勝利後至政府中樞遷臺，期間中國佛教會的籌備和在臺復會之歷程，可謂是最直接的呈現南老於中國佛教會時的歷史情況。<sup>5</sup>1966 年釋樂觀的〈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回顧〉，除論及國民政府時期佛教情況外，於後半篇章中則談及遷臺後漢傳佛教及中國佛教會之發展，也頗具歷史參考意義，<sup>6</sup>期間亦有部分相關論文接續研究。<sup>7</sup>至 2006 年，由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闕正宗和中正大學歷史系顏尚文教授，共同策劃進行整理中國佛教會檔案資料，<sup>8</sup>後又獲得教育部人文科技化補助經費，使相關史料文獻得以出版進行有效利用；<sup>9</sup>同時在其引領下之研究團隊，亦衍生出不少相關卓越專書與論文。而上述相關書籍與論文之中，不乏部分篇章涉及南老與中國佛教會之情況；<sup>10</sup>然而最直接涉及本文主旨，則是 2007 年由卓遵宏與釋印彬共撰的〈中國佛教會遷台的前前後後—兼論南亭法師秘書長任內的發展〉，其立題清晰、論述精闢、史料紮實，為目前論文析探有關南老與中國佛教會發展研究中，最為傑出代表作之一。<sup>11</sup>

可以說至今有關中國佛教會之相關議題，之所以能有如此蓬勃多項視角研究發展，除了中國佛教會本身的宗教意義和歷史價值非比尋常外，同時也拜闕正宗、顏尚文兩位發心付出，方得有《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出版，<sup>12</sup>俾利後續研究開展。上述各專書、論文的研究成果，可謂進一步釐清了中國佛教會初期在臺復會及其後續成長歷程，在南老擔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期間的部分，雖看似也將其事務脈絡勾

華嚴蓮社，2002 年）；釋成一原著，《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7 年），頁 103-109。

<sup>5</sup> 釋南亭，〈六年來「中國佛教會」之成就〉，《人生》6：11、12 合刊（台北：人生雜誌社，1954 年 12 月），頁 308。

<sup>6</sup> 按「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檢索，該篇最早成文是 1966 年 5 月釋樂觀於香港佛教聯合會發表。本文中則引述 1978 年後的再刊載本。釋樂觀，〈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回顧〉，收錄於張曼濤編，《民國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1978 年），頁 340-341。

<sup>7</sup> 諸如有：江燦騰，《台灣當代佛教》（台北：南天書局，1997 年）；周霖芳，〈中國佛教會在臺灣之發展（1945-195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sup>8</sup> 蘇全正，〈戰後臺灣佛教史研究與高等教育—以國立中正大學對於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之整理與利用為例〉《玄奘佛學研究》34 期，2020 年 9 月，頁 35-61。

<sup>9</sup> 參閱顏尚文，〈中國佛教會檔案資料研讀計畫〉教育部 97 年度人文學科，2009 年。

<sup>10</sup> 包含有闕正宗，《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沿續與開展》（台北：中國佛教會，2009 年）；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台北：中國佛教會，2010 年；黃慧茹，〈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陳雯宜，〈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發展（1949-2010）〉，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年等。

<sup>11</sup> 卓遵宏、釋印彬，〈中國佛教會遷台的前前後後—兼論南亭法師秘書長任內的發展〉，《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佛教會，2007 年），頁 81-114。

<sup>12</sup> 主要收錄了 1949 年至 2010 年間，有關中國佛教會之各屆會議紀錄內容和部分函件，全套共計 16 冊，採用原文件史料黑白印刷，同時搭配提要整理目錄出版，頗具研究價值。《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全套 16 冊（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 年）。

勒完整，不過仍未明確進一步探析南老的主體性本身。戰國時期的邏輯學家公孫龍，便曾提過著名的「白馬非馬論」<sup>13</sup>，歷史學的研究亦是如此，對於歷史的過往種種，多數只能知其一二，唯有再透過不斷的深化研究、開闢史料，拓展面向，方得更向歷史的原貌靠近。至 2016 年起隨指導教授卓遵宏參與多屆華嚴學研究研討會，發表拙文數篇；與會間受賢度院長開釋，提及：「創建華嚴專宗研究學術平台，就是為了進一步探悉華嚴的無窮奧秘」，同時鼓勵「學者們應該走進華嚴」，方將能拓展現有研究視野。<sup>14</sup>本文即是此啟發下，以此為立基點，試圖在前人豐碩研究中，探討南老深研華嚴的意境心向，和在中國佛教會事務作為之關聯性，期盼能以此拋磚引玉，同時冀望能為佛學研究增加綿薄之貢獻。

## 二、親教師的傳承與啟蒙

現今台灣的中國佛教會組織其實並非近代獨創，就歷史發展淵源甚早即有。中國佛教會的運作架構和本質傳統，其實是由過去歷朝各代中，已行之有年的僧官制度演變而來。<sup>15</sup>僧官制度最早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由國家任命僧眾中有德望的高僧，給予官職乃至俸給，從事糾察違戒失職僧尼的統理工作，也就是負責統領全國寺院僧尼以維持教法的官職。僧官不但是僧團的統理者，更是國家的職官，因此佛教與國家政治、社會的關係，產生了互為影響的互動關係，形成中國漢傳佛教的一大特色。<sup>16</sup> 1928 年中，北伐接近功成，各地通電歸附中央，同年 7 月，得蔣中正之助順利於南京毘盧寺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並由太虛法師自任理事長，此為佛教在國民政府治理下正式組織的肇建。<sup>17</sup>

<sup>13</sup> 為知名的哲理命題，其文言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名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又言：「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馬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即是論述「馬」是用來描述外形，而「白」是用來描述顏色，顏色與形狀屬於不同範疇，所以白馬不能說是馬。白馬是由顏色（白色）與外形（馬），兩種特徵結合而成。如果不具備顏色（白色）這個特徵，單單只有外形（馬），就不能說是白馬。延伸至歷史學研究範疇，泛指歷史具備多面向性，難以用現存已見得單面，去論及甚至代表歷史的全面性。〔周〕公孫龍，〈公孫龍子〉卷上，收錄於《正統道藏》中第 840 冊，太清部，三卷。

<sup>14</sup> 於 2016 至 2018 年兩岸各場華嚴研討會發表期間筆者所記。

<sup>15</sup> 星雲大師文集，「佛教的僧官制度」網站，<http://www.masterhsingyun.org.tw/article/article.jsp?index=14&item=29&bookid=2c907d4945ac514c0145acc337390005&ch=2&se=6&f=1>（2022/03/19）。

<sup>16</sup> 陳雯宜，〈中國佛教會在台灣的組織發展（1949-2010）〉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年，頁 9-17。

<sup>17</sup> 參閱黃夏年，〈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成立〉《中國文化》2010 年 02 期，頁 210-220。

然而隨著近代以來社會對廟產興學風潮影響，及國人固有對佛教之偏見，亦有不肖僧尼腐敗所致，<sup>18</sup>次年 1929 年，國民政府便片面著手訂立「寺廟管理條例」二十一條，<sup>19</sup>此舉勢必大幅度衝擊佛教固有的生存發展；以至於激起佛教各派僧信的一致團結，最終召集十七省代表，於上海成立全國性的佛教聯合會商議，並決議成立佛教會，從而擬定章程，呈請政府備案，同時訴求政府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中不合理之處。<sup>20</sup>可以說正是因為「寺廟管理條例」出臺，加速催生了中國佛教會的成立。確實，在歷經清末民初的大變革，部分固有的佛教僧伽制已漸生弊端，中國佛教會的成立，實則亦是有伴隨著對弊端改革的規劃，然而在政府暫緩「寺廟管理條例」後，<sup>21</sup>初期面對新有組織的設立再造，大多諸山長老僅持應付態度。<sup>22</sup>而在抗戰前的中國佛教會之內部，又分別有著太虛一派和圓瑛一派，雙方即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立，加以滬上一些名流居士從中播弄是非，兩派勢如水火。<sup>23</sup>

由於中國佛教會中兩派雙方相互攻訐，時正值三十而立壯年的南老，在自撰的《南亭和尚自傳》中便就其耳聞眼見，記到：

中國佛教會有太虛法師、圓瑛法師之兩派。太虛法師派主革新，圓瑛法師派主守舊。所以稱其為派者，以其各有學僧助陣，各有居士撐腰。兩派有如水火，頗有烏煙瘴氣之感。待在泰縣，曾接到傳單一紙，是毀謗圓瑛法師者。內容污穢不堪，好像圓瑛法師一文不值。此非出家人所宜為，……<sup>24</sup>

不過即便如此，綜觀南老個人立場，其實並無有派別偏袒。<sup>25</sup>這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受時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常惺法師<sup>26</sup>（以下將簡稱常老）的影響所致，其《南亭和尚自傳》文記到：

<sup>18</sup> 王驥陸，〈對於廟產興學之意見〉《海潮音》12 卷 2 期（1931 年 3 月），頁 6-9。

<sup>19</sup> 「國民政府訓令直轄各機關為明令公布寺廟管理條例令仰知照」（1929 年 1 月 25 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01-012100-00016-002。

<sup>20</sup>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中國佛教文化館，1974 年），頁 173-174。

<sup>21</sup> 「國民政府訓令立法院等為內政部請將寺廟管理條例暫緩施行令飭轉行各省維持現狀請鑒核照辦」（1929 年 5 月 25 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01-012100-00017-009。

<sup>22</sup> 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67。

<sup>23</sup> 何建明，〈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下）——以太虛與圓瑛之間關係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普門學報》第 25 期，2005 年 1 月，頁 1-23。

<sup>24</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14。

<sup>25</sup> 雖看似於《南亭和尚自傳》南老較偏向圓瑛保守一派，但若整理南老一生言行，諸如〈對現前的佛教回想當年的太虛大師〉、〈太虛大師與我〉、〈常惺法師集三版序〉，甚至是教材著作〈第八課 革命和尚與佛學大師——太虛〉，都可見南老對太虛大師的正面評價與列作楷模。

<sup>26</sup> 常惺法師（1896-1938 年）法名寂祥，如皋柴灣人。1914 年赴滬就讀於華嚴大學，隔年受戒於寶華山。1919 年任常熟法界學院教務長，之後又受聘為安徽佛教學校校長。1929 年於杭州主持僧侶學院，次年在北平主辦柏林教理研究院，併兼北京萬壽寺住持。1931 年至 1933 年間，擔任光孝寺

本師常惺老人，時任中佛會秘書長。性情溫和，無領袖慾，兩派皆與之有接觸。本師老人以為，無論新舊，只須適用，且以團結為第一要義。若夫兩派紛爭，甚至互相毀謗，實非佛教之福。因此奔走於兩派之間，舌敝唇焦，辛勞備至。<sup>27</sup>

常老，承光孝寺法脈，並曾於月霞大師創辦的華嚴大學深造，此後更「博綜羣經，貫徹性相，融歸於賢首，成一家之宗範」；<sup>28</sup>常老雖學貫諸宗，但在舉手投足言行舉止間，卻是以華嚴思想作為立足點，其佛學理論與佛教改革皆可視為對華嚴教義的踐行。<sup>29</sup>因此，顯然面對派系分立的中國佛教會時，常老實以華嚴平等諸宗，身體力行的調解佛教內部分歧。

對於常老和南老的關係，其二人因緣非比尋常。常老「學養豐博，為人器識非凡」<sup>30</sup>，早在安慶佛教學校期間，便是南老的親教師，沙彌期間的南老，深受的常老開釋講學，雖且年幼，多仍一知半解，但淺移默化下，亦也承襲其佛學哲理，悟出往後的處事真諦。<sup>31</sup>由於互為師生，加上在資源匱乏的年代，除日常讀經禮佛外，多數時的生活起居，同樣是互有交集，在經年累月的教學相長之下，南老不時對平日常老作風為人多表認同，其文記到：

常惺和尚是個大灑灑的人，也討厭這些瑣屑的事。<sup>32</sup>

正由於師徒兩情感深厚，南老於安慶迎江寺佛教學校畢業後，曾短暫閒居泰縣北山寺，承親教師常老的介紹，推薦至清涼寺親近應慈大師，聘任擔任佛學助教。<sup>33</sup>1933年底，見南老樸實聰敏又頗具慧根，常老便將光孝寺方丈交給於南老，對於被託付此重任的南老，南老更於日記中記到「可謂不知慚愧，不自量力也。」此後，亦稱常惺老人為「本師」。<sup>34</sup>1939年常老圓寂辭世，時正值抗戰，南老毅然「搜集常老

---

住持，隨後繼任太虛大師為南普陀寺住持和閩南佛學院院長，期間更被推為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抗戰期間，更是創辦收容所、佛教醫院，並帶領中國佛教抗戰僧侶救護隊，其聲名和功德事蹟，實不遜於太虛大師。參閱釋慧雲編，《常惺法師年譜》（江蘇：常熟興福寺，2012年）。

<sup>27</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114。

<sup>28</sup>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中國佛教文化館，1974年），頁851。

<sup>29</sup> 易中亞，〈常惺法師對華嚴思想的理解和應用〉《2016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台北：華嚴蓮社，2016年），頁K1-K12。

<sup>30</sup>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台北：華嚴蓮社，2002年），頁31。

<sup>31</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56-60。

<sup>32</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89。

<sup>33</sup> 釋南亭，〈靜波老和尚〉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頁170。

<sup>34</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100。

人，生平著述資料，彙聚為經釋、論釋、講演、著述、散文，詩詞，加上榮哀錄」以示緬懷，<sup>35</sup>可見其師生雙方情誼之深重。

常老對於南老的佛學教導與提攜力助，南老始終牢記於心且受用一生。1949年國軍即將撤守上海之際，由於飛機起飛限載，不得已南老特將原光孝寺隨身攜帶之貴重文物，包含「法卷、田契、寺誌、常惺和尚年譜，寄藏於上海中國銀行保險箱」內，<sup>36</sup>以盼來日得再行取回。由此也可見常老在南老心中地位之深重。而常老為人的處事作風，被南老視為圭臬典範，更是親自實踐履行；在主辦的智光高級商工職校時，南老提及到：

古來禪師們說：「平常心是道。」又說：「道在尋常日用中。」……然而我們是無知的一群，因為只講學術教義，而處世立身之道，我們最敬愛的常惺法師，從沒講過一個字。<sup>37</sup>

正因為常老的親力親為，不言之教的啟發，南老亦自撰德育課本，於智光高級商工職校，每星期親授一小時，在久而久之的身教言教下，學生們也漸所感化而有所改變。回顧常老和南老的啟蒙傳承關係，也說明了赴臺後的南老，當身為同樣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之際，面對會內人事問題爭議時，更多同樣是以華嚴平等諸宗，身體力行的態度坦然以對。

### 三、在台復會的虛懷若谷

1945年抗戰勝利，<sup>38</sup>在經過一年半整理後，1947年中，於南京舉行首次「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sup>39</sup>然而其靈魂人物太虛大師卻先於同年3月圓寂；<sup>40</sup>近代以來飽受摧殘的中國佛教已漸顯衰微，在太虛大師的辭世後，原有內部派別問題更趨複雜。1949年國共戰爭失利政府中樞遷台，混亂之際發生有僧伽捲入情治事件，為辦理擔保流程，同年9月，在東初法師邀請南老之下，中國佛教於台北十普寺第一次召開「駐台辦事處籌備會議」，<sup>41</sup>此時因理事長章嘉尚未至台，

<sup>35</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115。

<sup>36</sup> 釋南亭，〈江蘇泰縣光孝律寺誌略〉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9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頁95。

<sup>37</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55。

<sup>38</sup> 受抗戰影響，因政令所行僅限於四川重慶一隅，使得戰爭期間的中國佛教會務幾乎無法有效運作。闕正宗，《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沿續與開展》（台北：中國佛教會，2009年），頁60。

<sup>39</sup> 〈中國佛教會 將開代表會〉《中央日報》，1947年5月22日，第四版。

<sup>40</sup>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

<sup>41</sup> 釋樂觀，《中國近代史論集》（臺北：常樂寺，1978年），頁13。

故理事東初法師被推舉為主任，白聖法師、李子寬居士為副主任，南老則為秘書，白聖法師兼總務，黃為初、林宗心為聯絡，道源法師為調查，悟明法師、無上法師為幹事，同時向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呈請備案。至 10 月，中國佛教會駐台辦事處正式開始辦公運作，其首要工作便是因兩岸關係的敵對緣故，需就對當時由大陸來台之僧尼，展開相關登記辦理作業。<sup>42</sup>

1950 年 3 月，中國佛教會在臺恢復辦公，推東初法師兼指導組、白勝法師兼總務組、南老兼秘書長，會址設於台北十普寺，9 月會址改遷至善導寺，中國佛教會各項會務亦正式開展。<sup>43</sup>對於中國佛教會赴台復會準備的情況，南老於《南亭和尚自傳》中也多有筆墨記載：

至於中佛會的恢復，此乃去年之事。三十八年，章嘉大師自大陸來臺。彼時，我在十普寺。白聖法師請章嘉大師吃飯。大概有我一個、李子老、東初法師等人。席間談起中國佛教會來。章嘉大師在大陸就是理事長。今理事長既來，我們可以恢復中國佛教會。剛好，東初法師身邊有中國佛教會托他辦某事公文，公文上有中佛會印。東初法師、李子老固然是常務理事，白聖法師亦充常務理事，另外還有什麼人記不得了，總可以超過常務理事半數。徵得章嘉大師同意，照樣刻一中國佛教會印。我寫了中國佛教會的招牌，掛起來了。開了會，上呈文，內政部批准的公文也下來了。他們公推我當秘書長，其實什麼都沒有。只辦了清渡法師赴日本出境證的事，我就去臺中講經了。<sup>44</sup>

由於 1949 年大撤退影響，時局紛亂，藏傳活佛章嘉呼圖克圖大師甚至是至 1949 年 12 月，方才遷抵台北落腳圓山招待所。<sup>45</sup>也由於行程匆忙加以撤退時之混亂，以至於原中國佛教會的官印遺失，只得來臺後再行復刻。

又就上文內容與引文中的訊息含量其實相當豐富，首先以微觀角度探討，1950 年南老出任秘書長一職，雖於自傳中稱「其實什麼都沒有」做事，然而就筆者翻閱《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中國佛教會第三屆會議紀錄》，即是從 1950 至 1956 年南老擔任中國佛教會秘書任內期間，會議記

<sup>42</sup> 參閱〈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駐台辦事處籌備會議錄〉（1949 年 9 月 22 日），收錄於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一，會議紀錄系列之一第一冊》，（台北：中國佛教會，2010 年），頁 1、4-6。

<sup>43</sup> 參閱〈第一次會議〉（1950 年 2 月 24 日）、〈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950 年 8 月 29 日）分別收錄於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一，會議紀錄系列之一第一冊》，（台北：中國佛教會，2010 年），頁 9-12、13-22。

<sup>44</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66-167。

<sup>45</sup> 「蒙藏委員會電蔣中正謂章嘉呼圖克圖隨政府來臺灣擬晉謁特代電陳」（1949 年 12 月 21 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02-020400-00040-065。



錄呈現一明顯特徵，在 6 年期間，前後一共舉辦近百餘場大小各式會議。<sup>46</sup>南老不僅參與了絕大多數會議過程，且皆是擔任最重要的會議紀錄職務，可以說是兼辦在會前準備、會中參與、會後整理等行政重務，由此可見 6 年秘書長期間，南老始終積極參與和默默付出。而再由傳統中國文官體系行政公文系統興盛，進而形塑出所謂的階層簽名文化，<sup>47</sup>按職務大小依中國佛教會組織結構，首位為嘉章大師理事長，接續便是南老所任的秘書長，若再按在佛教界地位，就南老來台之後「當時的台北，他的聲望無能人超越」。<sup>48</sup>固然南老如此德高望重，但於每場南老曾參與之會議紀錄簽到欄位中，皆可以見南老刻意簽寫於後半段的謙卑之舉。

此外，再據學界對後戰後臺灣佛教發展多有研究，並對華嚴宗、南老、成公專研多年的卓遵宏教授，<sup>49</sup>其研究成果同樣表明，南老於中國佛教會秘書長期間，可謂最困頓的時期，但即便如此，仍積極籌劃會務進行，包含（一）護教與衛國：至 1951 年起函請軍方相關單位，管理任意佔住寺廟情況；請求內政部依例豁免宗教機構納稅，同時又訴求臺灣省當局，應適時保障廟產固有耕地；尊重憲法「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策畫護國仁王息災法會；聯合四大宗教，向美呼籲正視我方主權；發動一元獻機運動，以增加國家物力儲蓄。（二）宣教與救濟：延續主辦會訊，並改為《中國佛教月刊》；1952 年起，更假民本電台廣播，闢空中傳法「佛教之聲」節目；亦發動衣物捐贈活動，交分貧者應用；對避難香港僧伽展開募款救濟；對 1951 年花蓮地震、1952 年南部風災，接續發動募款和物資捐贈；其大陳島難民、清寒僑生、貧苦人士、僧尼及殘障老人，皆在救濟之列。（三）爭取國際友誼和培植學佛青年：促進中日佛教合作，為國爭取國際支持；及積極展開東亞佛教文化交流，拓展我國國際聲望；同時拔擢後進，竭力促成有志學佛青年四眾，從事佛學佛法深造。（四）傳戒整頓革除舊弊：整理日式僧人遺風，蛻變為應有漢傳佛教，僧侶嚴持戒律，革除時弊舊習。<sup>50</sup>種種事蹟貢獻，實不如南老自傳謙虛所言，由此印證南老虛懷若谷的心境。

<sup>46</sup> 此唯一估值，因顏尚文教授所進行整理之中國佛教會檔案中，由於考慮涉及隱私緣故，最終僅出版各屆會議記錄和部分檔案，其餘尚不便公開。顏尚文，〈中國佛教會檔案資料研讀計畫〉教育部 97 年度人文學科，2009 年。

<sup>47</sup> 階層簽名文化始於周代制定禮樂，祭祀講求身分關係起，至秦統一諸國行郡縣制，開啟官僚行政系統；依官階、按輩份的簽名前後尊長文化至此展開。

<sup>48</sup> 釋星雲，《百年佛緣（一）僧信之間》（台北：國史館，2012 年），頁 133。

<sup>49</sup> 卓遵宏（1943-2019 年），自幼穎異早悟，其後更保送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直取歷史研究所，學成後及第公務員高等考試，並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幹事兼秦孝儀機要秘書。1979 年再赴美德州大學深造，返台後於國史館任職研究員，公務之餘，著作不輟，其研究領域之廣泛深入，諸如唐代專史研究、近現代中國歷史、財經金融領域、當代人物研究、佛學歷史領域等相關書籍、論文不下百餘著，更先後於東吳、淡江等大學兼課執教，其學術貢獻與奉獻精神，可謂鮮少人所及。〈卓遵宏先生行述〉，2019 年 6 月 29 日，未刊稿。

<sup>50</sup> 礙於本文篇幅和敘述主軸，便不再展開論述。詳可參卓遵宏、釋印彬，〈中國佛教會遷台的前前

其次，延伸至大氛圍的歷史關注，繼太虛大師圓寂之後，論聲望與地位則首推當時章嘉呼圖克圖大師，因此便由章嘉大師承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之重職；而南老德高望重，此時同樣被公推出任秘書長高位。<sup>51</sup>但在 1949 年到臺後的新局面，面對來自大陸各省的大量僧尼，就東南一隅的臺灣省而言，可謂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期的星雲法師，於後來所撰的《百年佛緣（一）僧信之間》也談及「那時候大家都貧窮」的窘境，也敘述南老情況稍好，「有道場安居」<sup>52</sup>是有「福德因緣」。<sup>53</sup>對南老而言，出任中國佛教會要職，是為協助 1950 年代遷臺後，原有組織的復會與再造，待中國佛教會已得運行正軌，功成後即有意身退，意將機緣留於賢達之人，以助後進們的發揮。<sup>54</sup>這種不追求名利，處事謙讓心態，在諸多面向皆能獲悉一二，其中之一便是日後南老多次請辭中國佛教會職位之舉（礙於內文篇幅安排，於下半段再敘），另一具體例子，則可由 1952 年中國佛教會商討組織代表團，以赴日參加第二屆世界佛教徒連誼會過程探知。

世界佛教徒聯誼始創於 1950 年 5 月，當時最主要宗旨在於弘揚佛陀的偉大教義，並促進佛教徒之間的統一、團結和友誼。<sup>55</sup>由於 1949 年大歷史的發展，此時中華民國的台北當局，正處於風雨飄緲之際，對於參加 1952 年第二屆日本東京世界佛教徒聯誼活動，除得宏揚拓展佛教外，亦能藉此增加國際支持。<sup>56</sup>由於日方請柬建議代表團以 5 人為限，其經費由內政部補助（新台幣四萬元），並經批准得向台灣銀行匯率結購美金。最初，會議所選赴日代表需具有高深造詣的佛學能力，即：章嘉、印順、南老、慈航、演培等法師，<sup>57</sup>但南老考量政府財政不易，預算拮据，

---

後後一兼論南亭法師秘書長任內的發展》，《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佛教會，2007 年），頁 81-114。〈佛教界方面的慈善事業〉，《臺灣佛教》第 7 卷第 6 期，1953 年 9 月，頁 7-9。

<sup>51</sup> 章嘉大師為 1947 年 5 月出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但綜觀當時公告的第一屆當選理監事名單，尚未見及南老，在比對〈六年來「中國佛教會」之成就〉、《南亭和尚自傳》、《南亭和尚年譜》，皆僅談及 1950 年在臺擔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情況，由此可推估南老應是來臺後，方才進入中國佛教會服務；現今中文維基百科有關中國佛教會歷任職務表，應是誤植將南老秘書長從 1947 年起算。〈中國佛教會第一屆當選理監事〉《海潮音》第 28 卷第 7 期（1947 年 7 月）。

<sup>52</sup> 此處星雲法師所指為 1952 年底於台北創建的華嚴蓮社。

<sup>53</sup> 釋星雲，《百年佛緣（一）僧信之間》（台北：國史館，2012 年），頁 131。

<sup>54</sup> 此為筆者過往隨恩師卓遵宏共撰有關華嚴蓮社相關論文時，由學者卓遵宏教授親自口述華嚴蓮社歷屆過往點滴所知。或參考卓遵宏、釋印彬，〈中國佛教會遷台的前前後後一兼論南亭法師秘書長任內的發展〉，《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佛教會，2007 年），頁 81-114。

<sup>55</sup>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HISTORY」網站，<http://wfbhq.org/about-history.php>（2022/04/11）。

<sup>56</sup> 李添春，〈第二屆世界佛教徒會議經過報告〉《台灣佛教》第 6 卷第 5 期，頁 6。

<sup>57</sup> 參〈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1952 年 4 月 14 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頁 74-75。「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呈」（1952 年 6 月 10 日）；「商討中國佛教會擬派代表參加世界佛教徒大會問題會議紀錄」（1952 年 7 月 9 日）；「行政院院長行總統府秘書長文」（1952 年 8 月 9 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20-080302-0098。

外匯有限，<sup>58</sup>同時也意將機會給於後進新人，退居幕後進行赴日代表團宣傳文書和提案等草擬文書工作，<sup>59</sup>故而最終將機會讓於他人。<sup>60</sup>南老謙讓的態度行為，誠如南老於 1950 年代在電台廣播弘法宣講《佛說孛經鈔》講述到：「聖孛說，有八事可保持安樂」，其中「謙虛上下」就是「對『上』對『下』存一個『虛』懷若谷的『謙』讓心。」<sup>61</sup>茲對比列述南老過往事蹟點滴，可以說不論是在情誼、精神、準則，皆令後人所敬佩仰慕。

#### 四、功成後退以提攜後進

戰後 1947 年中國佛教會的正式成立，本是集結各諸山長老、大德高僧，好於佛教界形成一有共識的組織團體，以對政府發聲諫言，於世人宏揚佛法；然而不分佛門宗派、地域省籍、新舊派別，不免會有意見上的齟齬或人事上的不合，對此，南老也承認，過往「中國佛教會的組織，在系統上不能說不完整，因為不夠嚴密」，所以「沒有充分發揮出它的能力」。<sup>62</sup>1949 年後中國佛教會隨政府中樞遷台，並於翌年復會，由於時局的劇變，更加劇了各種潛在問題。<sup>63</sup>以在台復會後第一屆中國佛教會人事組織為例，大體可簡化區分為以臺灣光復初期具本土地域性的南瀛佛教會，江蘇、上海為主的法師所代表的外省僧伽、<sup>64</sup>和李子寬居士為首的黨政代表<sup>65</sup>

<sup>58</sup> 在南老自傳《南亭和尚自傳》中，便有充分顯露憂國憂民，勤儉為國的理念，曾有一日南老奉智光法師之命，親自拜訪林彬部長，見到其勤儉。不經意從心底下泛出一句：「這是我政府裡的一位好官。」並舉「漢朝楊震的四知、南宋朱文正公煮的脫粟飯待客」，其清廉的風操格調，令人敬佩。「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河山可以光復」。而「今天的國難尤甚於南宋」，其儉德為國「值得我們效法」。南亭，〈從儉德看偉人〉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294-296。

<sup>59</sup> 〈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1952 年 6 月 20 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頁 96-98。

<sup>60</sup> 「正式代表姓名簡歷表」（1952 年 8 月 9 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20-080302-0098。

<sup>61</sup> 釋南亭，〈第三十六節 聖孛說有八事可保持安樂〉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159-160。

<sup>62</sup> 釋南亭，〈對現前的佛教回想當年的太虛大師〉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179。

<sup>63</sup> 1949 年撤退至臺灣後，大陸各省法師可說失去原有的信眾與祖寺；同時政府為加強保衛台海力度，亦升高對各方的管控制約。可參閱周霖芳，〈中國佛教會在臺灣之發展（1945~195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sup>64</sup> 楊惠南在此處雖指出證蓮、太滄、智光等『三老』，南亭、東初等『二老』，以及一些次級人物；但實際上智老到台後，已鮮少過問俗世，南老在中國佛教會期間，秉持先師常老教誨，實則中立以對，亦無明顯派系選邊。楊惠南，〈當代台灣佛教「出世」性格的分析〉，《東方宗教研究》1 期，1990 年，頁 330。

<sup>65</sup> 范國展，〈李子寬與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

等。從復會第一屆之初，亦漸顯露彼此間立場不同的跡象，於《南亭和尚自傳》曾有如下記道：

李子老利用我向白聖法師索取印信、卷宗與招牌。承白聖法師看得起，他向我說：「老兄！這是你向我要的，我給你。如果是李子寬，我才不給他呢！」我只有道謝而已。<sup>66</sup>

由上文中可知，不論是李子寬或是白聖法師，皆信任於南老。對於兩派關係，南老實則承用常老傳授，以華嚴平等諸宗之思維去面對人事上難題，其用意仍是希望盡力維持中國佛教會之該有運作，同時亦讓兩造關係得和諧共存。

著名宗教研究學者之一的韓煥忠教授，雖於〈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提到南老對於遷台後的中國佛教會領導機構內部運作問題，感受到無能為力，致使其倦勤而萌生辭意。<sup>67</sup>其實此為俗事表象的一面；本文拜卓遵宏教授過往點滴指導積累，方從中透析南老與中國佛教會更深層之關係，也正因為南老的虛懷若谷，鮮少告知他人心意，以至於世人未盡能理解悟出真相的全面。南老對中國佛教會的見解和目標，本意在使遷台後的中國佛教會得能恢復正常運作，避免重蹈在大陸時期窒礙難行的窘況；又當在中國佛教會復會功成圓滿之後，南老便急流勇退讓賢他人，好專於弘法重任。<sup>68</sup>正如南老傳記中所言：「實現在家、出家學佛者的正當目標——自利、利人的菩薩行。如此，欲想佛教於今後事事維新的世界，屹立不動，甚至發揚光大，那是不可想像的事！」<sup>69</sup>因此，當 1950 年 9 月中國佛教會復會第一屆，始滿一年正軌運作後，南老旋於 1952 年初首度提出辭意，經各法師強烈慰留後，南老勉為同意慰留，但亦新聘黃一鳴居士為秘書，<sup>70</sup>一來是完善中國佛教會組織架構，俾利行政會務執行，二來則是有意提攜後進培育英才，以便來日讓賢他人。

至第一屆期滿，於 1952 年 7 月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之際，南老已見時機成熟，至此正式提出辭職。<sup>71</sup>在《南亭和尚自傳》中更隱約顯露了南老的讓賢初心，其文言道：

<sup>66</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66-167。

<sup>67</sup> 韓煥忠，〈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201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佛光，2020 年），頁 558-574。

<sup>68</sup> 卓遵宏教授於 2000 年和華嚴蓮社結緣，更於後來為南老之弟子成公撰寫訪談回憶錄，從而更得深入了解南老身前過往。釋成一原著，《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7 年）。

<sup>69</sup> 釋南亭，〈對現前的佛教回想當年的太虛大師〉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179。

<sup>70</sup> 參〈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第四次理監聯席會議〉（1952 年 1 月 17 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頁 57。

<sup>71</sup> 根據會議記錄顯示，此時秘書長一職已由劉中一居士出任。〈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第一

七月十二日，中國佛教會開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常務理事九人、監事、理事長。……票選的結果：章嘉、白聖、悟明、星雲、孫心源、吳仲行、孫清揚、趙恆惕、劉中一當選為常務理事……。又票選理事長，章嘉大師以最高票數當選。……章嘉大師的確是有威德、福報的人。他的鎮定力無人能及。我坐在他左側，自始至終，未置一詞，面不改色。我想，他即使落選，也會拱手讓賢，而毫無怨尤。……。當時有人（經筆者比對查詢，為劉中一居士）提議，由我任秘書長，我向提議的人磕了一個頭，敬謝不敏。等到提議我者任秘書長，我把一點點卷宗當眾交給他，轉過身來，向章嘉大師合個掌……<sup>72</sup>

值得注意一事，就核心成員常務理事中，青年輩的星雲法師脫穎而出，當時星雲法師雖是南老晚輩，亦非嫡傳弟子，但兩人仍於平日交流中，結下深厚的道情和法誼。<sup>73</sup>劉中一居士則和南老頗有深交、值得托信，也正是因為中國佛教會組織運作日益健全，同時又得有賢達新血注入，南老方得安心淡出中國佛教會秘書長職位重務。

然而事與願違，1952年10月原南老提攜秘書黃一鳴居士請辭獲准，<sup>74</sup>而後接續南老秘書長的劉中一居士，又因公受傷折斷臂骨，<sup>75</sup>此時，中國佛教會內一度已有意再聘南老回任秘書長一職，唯南老之初衷善意未改，故僅勉允掛名，實際先由常務理事吳仲行居士暫代之，亦好讓劉中一居士辭職養傷。<sup>76</sup>隔年6月劉中一居士堅持請辭，並於會議中再次提議，力薦由第一屆秘書長南老回任秘書長要職。<sup>77</sup>面對中國佛教會內部人事的再次動盪，南老雖已淡出核心，但於《南亭和尚自傳》仍見其關切憂慮之心，其文記到：

中佛會自推余為秘書長以來，曾以事去一、二次，觀其無人領導，心焉憂之。<sup>78</sup>

次會議記錄》（1952年8月31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頁27、30。

<sup>72</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187-188。

<sup>73</sup> 對於南老的欣賞、讚歎、提攜和幫助，星雲大師不僅有強烈的感受，銘記在心，而且還曾經投桃報李。即便是在南亭長老圓寂數十年之後，星雲大師回憶起二人之間的這段交往，還依然充滿了真摯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意。詳見韓煥忠，〈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201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佛光，2020年），頁558-574。

<sup>74</sup>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1952年10月20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頁109、119。

<sup>75</sup>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1952年12月19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頁147。

<sup>76</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206。〈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1952年12月19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頁156。

<sup>77</sup>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第八次會議記錄〉（1953年6月9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頁191、193。

<sup>78</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207。

面對困境再起，南老毅然再度承接秘書長一職，同時會議上再加聘成公為秘書，以負責編輯中佛會會訊；<sup>79</sup>值得注意一點，與之同期的在南老《南亭和尚自傳》中，更首度用極大篇幅，記述了對其弟子成公的相關側寫，其文擷取重點摘錄如下：

成一，一字壽民，俗姓王，小同鄉也。十五歲出家於營溪觀音寺，與余同一出家之寺廟，分屬余之徒孫。……三十一年，余退居，伊要求赴滬習醫，並聲明，不改出家宗旨。余諾之。蓋僧伽有不違佛法之職業，為大乘所許。至滬，入上海中醫學院，余又介紹其住食於九畝地青蓮庵止方和尚處。……事已後，看破一切，來余處養病，允之，並助其醫藥費用。恢復健康後，要求恢復僧裝，俾便修持，亦成就之。六月初六恢復僧裝日，為發帖請客，恢復學名為成一。成一在青年僧中算很不錯，只是隨俗久，而作息時間不同。因勸諭之，乃改正。且知精進。<sup>80</sup>

從傳記前後行文關係，以及上述引文內容，不難看出，南老對成一實則寄與厚望，慧眼看出成一是位可栽培的弘法人材。此後南老更將成一隨攜左右，甚至於民本電台創立佛教之聲節目後，共邀成公宣講佛法，<sup>81</sup>其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能為中國佛教會培植優秀的青年人材。<sup>82</sup>

1955年8月中國佛教會首度召開第三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但也因此引發會員代表資格的爭議問題，<sup>83</sup>最終再度引發人事請辭異動，由於涉及甚廣，在理師長章嘉大師、<sup>84</sup>李子寬居士相繼請辭後，<sup>85</sup>南老亦遵循章嘉大師共同進退。<sup>86</sup>因茲事體大，以至於內政部介入中國佛教會進行改組，1956年8月4日下令組成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以章嘉大師為主任委員，其餘包含南老在內共有16名委員，以維

<sup>79</sup>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記錄〉（1953年8月26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頁218、222。

<sup>80</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207-208。

<sup>81</sup> 釋成一原著，《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7年），頁263。

<sup>82</sup> 1960年，成公當選中國佛教會監事，此後更應中國佛教會徵召，隨團出席在越南西貢市召開的「世界佛教僧伽服務社會大會」，甚至率團代表訪問越南、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遂可見成公繼南老後對中國佛教會的投入參與，至1986年後，成公更升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參閱釋成一原著，《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7年）。

<sup>83</sup>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道安法師日記（七）》（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年），頁1429-1430。

<sup>84</sup> 〈章嘉呼圖克圖請辭函：「因不適應氣候，導致老體力衰，請辭理事」〉（1955年8月30日）轉引至黃慧茹，〈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頁78。

<sup>85</sup>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道安法師日記（七）》（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年），頁1434。

<sup>86</sup> 〈南亭請辭函：「為專心弘法，辭去理事及常務理事職務。」〉（1955年9月15日）轉引至黃慧茹，〈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頁79。

持會務、整理會籍、登記會員與籌備改選為其工作重點。<sup>87</sup>南老曾言「佛教徒是以無諍為特色」；<sup>88</sup>過去歷史上雖不乏有所謂的佛門宗派之爭，然而南老認為「賣瓜的人，沒有一個不喊，自己的瓜甜，但不能指他人的瓜苦」<sup>89</sup>，這從中顯示佛教愛好和平的宗旨，而「過去的門戶之見，就是現在的組織，組織就是團結，團結就有絕大的力量」。<sup>90</sup>因此，在改組期間的會議記錄中，不時可見南老居中協調多次商議，最終方訂出《中國佛教會會員會籍清理登記辦法》<sup>91</sup>，至 1957 年 6 月正式完成相關會籍之登記整理，遂弭平原有之紛擾。隨著中國佛教會再復正軌，此時南老亦正式功成身退，不再續接相關要職，亦是將機會禮讓於後進賢達之人。

## 五、結論

當代知名大師賢度院長，曾言到：「佛學即是實踐的哲學，行道與哲理應是極為諧調而又相輔相成的體系。《華嚴經》就是最能符合這個原則的一部經典」。<sup>92</sup>自近代中國佛教會成立以來，內部的人事和組織運作始終是極具挑戰；在常老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職務時，便以華嚴平等諸宗之思維去面對人事上難題。而沙彌時期起的南老，深受常老身教言行的開示，其後再經華嚴學的薰陶，故而得傳承了常老哲理態度；1949 年後中國佛教會遷臺復會，由於南老德高望重，公推出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一職；然而即便位高權重，卻依然秉持虛懷若谷的心境，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南老對中國佛教會的見解和目標，本意在對遷臺後的中國佛教會，得能恢復正常應有運作，避免重蹈在大陸時期的窒礙難行的窘況，而後功成身退，提攜後進，以專於弘法重任。誠如學者韓煥忠教授所言：「南老是一位正直、坦誠、熱心、修持嚴謹的老法師。」<sup>93</sup>中國佛教會得以在臺穩定發展，與南老的無私奉獻不無關係。南老是一位為了弘揚佛法、續佛慧命而盡心盡力的得道高僧，在會務漸趨穩定之際，毅然急流勇退，以讓賢於後進英才，其精神為佛教留下了仁者的典範。綜觀南老與戰後中國佛教會之運作和其哲理的實踐，可以說是口熟其文，心解其義，身體力行而體悟見性，以盡其一切的促使佛教光彩綻放於人間，遍滿十方世界。

<sup>87</sup> 請參《中國佛教會首度第三屆、整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內整理委員會的全部會議紀錄，頁 153-228。

<sup>88</sup>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89。

<sup>89</sup> 釋南亭，〈從永嘉大師證道歌說到門戶之見〉，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冊 9（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84。

<sup>90</sup> 釋南亭，〈從永嘉大師證道歌說到門戶之見〉，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冊 9（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84。

<sup>91</sup>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1956 年 9 月 17 日），《中國佛教會首度第三屆、整理委員會會議紀錄》，頁 161-164。

<sup>92</sup> 釋賢度，〈華嚴行門具體實踐之研究〉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第二屆畢業論文，1980 年。

<sup>93</sup> 韓煥忠，〈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201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佛光，2020 年），頁 558-574。

## 六、徵引文獻

### (一) 檔案史料

1. 「國民政府訓令直轄各機關為明令公布寺廟管理條例令仰知照」(1929年1月25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01-012100-00016-002。
2. 「國民政府訓令立法院等為內政部請將寺廟管理條例暫緩施行令飭轉行各省維持現狀請鑒核照辦」(1929年5月25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01-012100-00017-009。
3. 「蒙藏委員會電蔣中正謂章嘉呼圖克圖隨政府來臺灣擬晉謁特代電陳」(1949年12月21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02-020400-00040-065。
4.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呈」(1952年6月10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20-080302-0098。
5. 「商討中國佛教會擬派代表參加世界佛教徒大會問題會議紀錄」(1952年7月9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20-080302-0098。
6. 「正式代表姓名簡歷表」(1952年8月9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20-080302-0098。
7. 「行政院院長行總統府秘書長文」(1952年8月9日),國史館典藏,典藏號:020-080302-0098。
8.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1956年9月17日),《中國佛教會首度第三屆、整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9. 〈第一次會議〉(1950年2月24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10.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950年8月29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11.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52年8月31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
12. 〈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1952年4月14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13. 〈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1952年6月20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14. 〈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駐台辦事處籌備會議錄〉(1949年9月22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15. 〈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台第四次理監聯席會議〉(1952年1月17日),《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



16.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1952年12月19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
17.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1952年12月19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
18.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1952年10月20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
19.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記錄〉(1953年8月26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
20.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第八次會議記錄〉(1953年6月9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

## (二) 報刊

〈中國佛教會 將開代表會〉《中央日報》，1947年5月22日，第四版。

## (三) 專書

1. 公孫龍〔周〕，〈公孫龍子〉卷上，收錄於《正統道藏》中第840冊，太清部，三卷。
2. 江燦騰，《台灣當代佛教》，台北：南天書局，1997年。
3. 卓遵宏、侯坤宏、廖彥博，《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7年。
4. 范觀瀾，《成一法師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
5. 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6.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台北：華嚴蓮社，2002年。
7.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台北：中國佛教會，2010年。
8.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道安法師日記(七)》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年。
9.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
10. 釋成一、釋聖嚴，《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臺北：華嚴蓮社，1983年。
11.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中國佛教文化館，1974年。
12.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年。
13. 釋南亭，《聖孛說有八事可保持安樂》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
14. 釋南亭原著，《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年。
15. 釋星雲，《百年佛緣(一)僧信之間》，台北：國史館，2012年。
16. 釋慧雲編，《常惺法師年譜》，江蘇：常熟興福寺，2012年。

17. 釋樂觀，〈《中國近代史論集》〉，臺北：常樂寺，1978 年。
18. 闕正宗，〈《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沿續與開展》〉，台北：中國佛教會，2009 年。
19. 闕正宗，〈《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漢傳佛教的沿續與開展》〉，台北：中國佛教會，2009 年。

#### (四) 期刊論文

1. 〈中國佛教會第一屆當選理監事〉《海潮音》第 28 卷第 7 期（1947 年 7 月），頁 33-34。
2. 黃夏年，〈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成立〉《中國文化》2010 年 02 期，頁 210-220。
3. 王驥陸，〈對於廟產興學之意見〉《海潮音》12 卷 2 期（1931 年 3 月），頁 7-9。
4. 卓遵宏、釋印彬，〈中國佛教會遷台的前前後後—兼論南亭法師秘書長任內的發展〉，《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佛教會，2007 年，頁 81-114。
5. 〈卓遵宏先生行述〉，2019 年 6 月 29 日，未刊稿。
6. 南亭，〈從儉德看偉人〉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294-296。
7. 南亭，〈靄老與南老〉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 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 年），頁 206-208。
8. 顏尚文，〈中國佛教會檔案資料研讀計畫〉教育部 97 年度人文學科，2009 年。
9. 何建明，〈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下）——以太虛與圓瑛之間關係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普門學報》第 25 期，2005 年 1 月，頁 1-23。
10. 李添春，〈第二屆世界佛教徒會議經過報告〉《台灣佛教》第 6 卷第 5 期，頁 6-13。
11. 易中亞，〈常惺法師對華嚴思想的理解和應用〉《2016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台北：華嚴蓮社，2016 年），頁 K1-K12。
12. 釋樂觀，〈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回顧〉，收錄於張曼濤編，《民國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1978 年），頁 311-355。
13. 李守靜，〈鎮江焦山佛學院〉《鎮江文史資料》第 7 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鎮江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 年，頁 83-91。
14. 楊惠南，〈當代台灣佛教「出世」性格的分析〉，《東方宗教研究》1 期，1990 年，頁 317-343。
15. 韓煥忠，〈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201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佛光，2020 年），頁 558-574。

16. 〈佛教界方面的慈善事業〉，《臺灣佛教》第7卷第6期，1953年9月，頁7-9。
17. 蘇全正，〈戰後臺灣佛教史研究與高等教育—以國立中正大學對於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之整理與利用為例〉《玄奘佛學研究》34期，2020年9月，頁35-61。
18. 釋南亭，〈六年來「中國佛教會」之成就〉，《人生》6：11、12合刊（台北：人生雜誌社，1954年12月），頁308。
19. 釋南亭，〈江蘇泰縣光孝律寺誌略〉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9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頁86-97。
20. 釋南亭，〈從永嘉大師證道歌說到門戶之見〉，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冊9，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頁79-84。
21. 釋南亭，〈對現前的佛教回想當年的太虛大師〉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頁177-184。
22. 釋南亭，〈靜波老和尚〉收錄於《南亭和尚全集》11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頁169-177。

#### （五）學位論文

1. 周霖芳，〈中國佛教會在臺灣之發展（1945~195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2. 周霖芳，〈中國佛教會在臺灣之發展（1945-195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3. 范國展，〈李子寬與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4. 陳雯宜，〈中國佛教會在台灣的組織發展（1949-2010）〉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5. 黃慧茹，〈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6. 釋賢度，〈華嚴行門具體實踐之研究〉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第二屆畢業論文，1980年。

#### （六）網路資料

1.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HISTORY」網站，<http://wfbhq.org/about-history.php>（2022/04/11）。

2. 星雲大師文集，「佛教的僧官制度」網站，<http://www.masterhsingyun.org.tw/article/article.jsp?index=14&item=29&bookid=2c907d4945ac514c0145acc337390005&ch=2&se=6&f=1>（2022/03/19）。
3. 華嚴蓮社，「第一任 智光和尚」網站，[https://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2099&modid=392&mode=](https://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2099&modid=392&mode=)（2022/03/16）。